

中国近代“商务”和“商业”观念研究*

樊 果

内容提要: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出现大量重商思想,一些思想家和官员纷纷提出“恃商为国本”,“借商以强国”等,主张振兴商务。本文使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通过期刊文章研究1833—1936年间“商务”和“商业”观念。从中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社会公众对商务和商业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关注内容广泛,“商”并不局限于流通领域,而是涵盖农业、工业、交通运输、金融等产业及相互间的联系,不仅包括国内外经济形势、贸易往来、货币金融和财税状况,而且包括经济法规、商务制度、经济政策、商业教育等多个方面。从构成和数量变动趋势来看,与“商”有关的社会观念逐渐更加具有务实的特点。

关键词:商 商务 商业 近代 经济观念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晚清一些思想家和官员纷纷提出谋求国家富强的主张,振兴商务、发展商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外国商品冲击着国内市场,西方制度和观念也逐渐传入中国,与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有碰撞也有交融。任何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不仅包含那些外部的、能够公开考察的部分(上层),而且包括在其之下越来越复杂的不同层次上的各种关系网(下层),不同学者以各自的目的和方式对上层和下层进行区分并进行抽象研究。^①由此可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内容粗略地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重要人物的思想和主张,另一方面是存在于社会公众中的观念。赵丰田、胡寄窗和赵靖等学者的著作中包含一些著名人物的经济思想,张亚光、孙大权、严清华等^②通过经济类出版物和经济期刊研究民国时期经济思想。运用期刊文章具体研究近代中国与商有关的观念,目前似乎鲜有人做。振兴商务和发展商业是近代中国在追求国家富强中提及较多的主张,本文使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1833—1936年间标题中含有“商务”和“商业”、并且内容与分析“商务”和“商业”作为一个经济学名词怎样被使用这个问题相关的文章,以此为视角研究存在于社会公众中的经济观念。

一、中国古代与“商”有关的经济思想

中国历史上较为系统地论述经济问题的著作不多,但在不少文人政客流传于世的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参考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③考察自春秋时期到清代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 79

[作者简介] 樊果,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100836,邮箱:fanguo@cass.org.cn。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近百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户经济的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对现实感的论述可参见[英]以赛亚·伯林著,潘荣荣、林茂译《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② 张亚光:《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经济科学》2008年第1期;孙大权:《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严清华:《民国时期经济期刊的经济思想文献述评》,《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7期。

③ 主要参考: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赵克尧:《重农抑商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巫宝三:《唐代重商思想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叶坦:《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傅允生:《重本抑末的时代特点与学派倾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叶世昌:《司马迁经济思想新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周建波:《孔子经济思想简论》,《孔子研究》2010年第5期。

位重要人物或著作中与商有关的经济思想,从中可以发现不抑商的主张多于抑商主张(见表1)。其中主张适当发展商业的原因主要是商业能实现商品流通,农与商之间相互促进发展,对百姓来说可以通过经商而治家、富家,达到民富,对统治者来说藉此解决民生问题,也增加商税收入;认可“商”的作用或地位的理由主要包括,士、农、工、商四民相安,均属正当职业,商业是百姓生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商品流通能使民众财用足,易生活,商与农相补充;抑商主张重点强调商与农之间的对立,^①认为农业是富家、富国的源泉,商业的发展会减少务农人口,影响农业生产,此外商贾坏心术;具有抑商倾向的思想,多是出于对经商人口增加的担忧,主张限制商贾数量,鼓励百姓多从事农业生产。

在这些经济思想中,大多重视农业,对商业通有无的功能也有相当多的认识。适当发展商业和认可商业地位的一些主张也强调商业的发展要以不妨碍农业生产为前提,在抑商思想中,也部分认可商品流通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重农的传统,但未必抑商;^②既重视富国,也重视富民。

表1 中国古代与“商”有关的经济思想统计

	不抑商(合计:62)		抑商(合计:17)	
	提出适当发展商业(30)	认可“商”的作用或地位(32)	主张抑商(12)	有抑商倾向(5)
春秋	管仲	孔子、《左传》		
战国	孟轲、战国法家、荀况、《周礼》	墨翟、《国语》	商鞅、商君学派、韩非	李悝
西汉	桑弘羊、司马迁、《盐铁论》	刘安	贾谊、桓谭	晁错、《管子》
东汉	班固	何休、《太平经》、王符		
三国	曹操		诸葛亮	傅玄
北朝			贾思勰	
唐	崔融	刘秩、刘晏、陆贽、韩愈、白居易	元稹	
北宋	李觏、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	苏洵、张方平、叶梦得		
南宋	袁燮、叶适	陈亮、陈耆卿		
元		许衡、卢世荣		
明	丘浚、张居正、唐枢、许孚远、汪道昆	王守仁、陆楫、何心隐、李贽、霍韬、许相卿、庞尚鹏、姚舜牧	徐光启	
明清之际	黄宗羲、王夫之、李雯	唐甄	张履祥	
清(鸦片战争前)	王源、蓝鼎元、包世臣	恽敬、龚自珍、谢阶树	颜元、李塨	管同

二、中国近代与“商”有关的经济思想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魏源提出发展商业是缓本急标之法,徐继畲、曾国藩、严复从国与国之间力量对比中提出商业的重要性。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认为国家富强依赖于商业的发展。李鸿章认为求富的重要途径是振兴商务,提出发展民用工业,民生富裕和国家富裕后国家可实现强大。宋教仁提出通过开发产业和振兴商业使国家先致富再图强。康有为、宋育仁提出工是国本,商具有重要辅助作用。张之洞、张謇提出农、工、商相互联系,发展工和农能够实现富国强兵。谭嗣同主张中国促进工、商、矿等方面的发展。梁启超提出农、矿、工、商四者相需,

^① 张建军《〈管子·轻重〉重农抑商思想特色》(《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张秀雯等《“路径依赖”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制度》(《唐都学刊》2005年第2期)分析了中国古代农与商之间的矛盾,袁林《〈管子〉商业思想的基调是抑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李金玉《聚民思想对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进一步分析了商贾与君主统治间的矛盾。

^② 对商人和商业、私商和官商的区分可另参考韩朝华《略论“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经济科学》1988年第6期)、巫宝三《唐代重商思想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缺一不可。孙中山提出大力发展包含农、工、商、矿在内的实业,以解决民生问题。孔祥熙提出实业包含工、商、农、林、渔、牧、矿、垦各业,充分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计。其他还有王炳燮、刘锡鸿、曾廉提出重农抑商,认为民贫的原因是弃本逐末,重农抑商能够广生财源,求富只能依靠重本。

将近代这些重要人物的经济思想与中国古代与商有关的经济思想相比较,可以看出重农思想依然存在,但更多是把农业作为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加以重视,抑商思想占极少数;发展商业已不局限在通有无的作用上,而是被置于由此实现国家富强的高度,发展商业也不仅仅局限在流通领域,而是与农、工、矿等产业协同发展;^①包含重商在内的发展经济的主张,大多数是以国家富强为目标,^②富民和民生问题被提及较少。

三、中国近代有关“商”的观念

本文所使用的《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收录302种期刊,近29万篇,《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已推出的三辑中收录三千多种期刊,超过240万篇。这两个数据库中1833—1936年间标题中含有“商务”的有效文章共3589篇(来源超过150种期刊),^③标题中含有“商业”二字的有效文章共8400篇(来源超过210种期刊),其中有关国外问题文章为2054篇,有关国内问题文章为9935篇。两类文章所涉及主题相似,在下文中合并进行分析。

与“商业”的使用相比,在“商务”的使用中包含了更多对国外经济问题的关注。国外经济问题主要包括:(1)英、美、德等主要国家及城市的商务状况、商业政策和发展分析。(2)不同行业和重要商品贸易市场状况。涉及农业、工业、运输和邮电业和金融等行业。重要商品市场如纽约钨市、伦敦棉市,曼彻斯特棉货,利物浦橡皮等。(3)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概况。如世界货币问题、不同国家间的商业竞争与合作等。(4)外国货币金融财税。如货币铸造额、钱币规则、汇兑市况、财政状况等。(5)外国商务制度。包括度量衡通行法、专利章程、同业同盟法等。

有关国内相关问题的文章可划分为经济概情与调查统计,教育和常识普及,商务条约、经济法规和政策,经济问题探讨,经济机构和组织事务五个领域。分别分析“商务”和“商业”中有关国内问题的文章构成,其中经济概情与调查统计类文章在二者中均占最大比重(分别为49%和61%),条约、经济法规和政策类文章也较多(分别为20%和11%),有所不同的是,“商务”中教育和常识普及类文章占比较小(为8%),而“商业”中此类文章占比较大(为16%),“商务”中经济机构和组织事务类文章占比较大(为14%),而“商业”中此类文章占比较小(为3%),经济问题探讨类文章在二者中均占9%。

经济概情与调查统计类文章主要包括:(1)商务总体发展状况描述与判断。(2)各地商务、商业状况及物产调查。(3)不同行业状况。涉及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和邮电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和公用事业。(4)中外商务商业状况和贸易统计。如中国与美、日等国的商业统计,对外贸易和国内埠际贸易统计。(5)财税和货币金融问题。如国库券发行、金融公债、关税收入、厘税管理等,如利息行市、汇兑行市、股市、期现货成交状况和银庄、银行等业务。

教育和常识普及类文章主要包括:(1)学校与机构。如商务学堂、商业夜校、商业图书馆等的创办。(2)书籍和常识普及。如创办商业杂志、翻译经济类书籍,详解商业用语,普及商业票据等应用性常识。(3)外国商务、商业教育制度介绍。

^① 绿文:《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初步转换:晚清重商思想述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提出晚清重商思想中包含着重商——重工、观念——制度、单维——系统的演进逻辑。

^② 冯筱才:《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认为晚清重商主义的核心是经济民族主义,“商战”是主要口号;张霞《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总结出近代中国以商立国论、以工立国论和以农立国论三种立国思潮。

^③ 一些标题中含有“商务”二字但内容并不相关的文章,比如《美国驻沪商务参赞得华盛顿内外商务局电》,或《航运及陆运(译英国商务局报)》等等,均不计入。标题中含有“商业”二字的文章做相同处理。

条约、经济法规和政策类文章主要包括:(1)中外商约和通商口岸租界章程。(2)工商业法令解释。如在工业、运输和邮电、金融和文化产业等方面的管理和税收规定等。(3)经济政策和配套制度。如制订振兴工商业办法,发展航运以兴商业,减免税收以救济商业,改善金融组织以发展工商业,整顿财赋,管理关税,制订商业注册办法,倡导票据贴现制度等。(4)经济活动和管理。如官商合办公司,制定银行、自来水厂、盐务公司等章程,对一些行业进行管制和整顿。

经济问题探讨类文章主要包括:(1)对商务和商业本身的分析。如通商利害分析、商业与社会繁荣、商业与富国等。(2)对发展状况的分析。如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中国工商业不发达的原因。(3)对影响因素的分析。如气候、战争、交通状况、金融市场、税收、商业教育等与商业的关系。(4)对发展商务的建议。如制定法律、签订商约、奖励小工商业、提倡国货等。(5)对中外商务、商业活动及国际经济状况的分析。如中国与英、美等主要国家的商务关系和商业活动,各国商业政策、重要商品行业状况等。(6)对货币金融的分析。如铸币制度与比较、货币与物价、银行制度。

经济机构和组织事务类文章主要包括商务总会、分会的设立、批示等活动及商务分会简章等,以及其他不同商业组织和团体对经济活动的参与。

“商务”和“商业”分别于1880年和1896年首次在期刊文章标题中出现,在1910年之前,“商业”在文章标题中出现次数少于“商务”出现次数,自1910年起与此相反,从该角度来看,随着时间推进,“商业”比“商务”得以更普遍的使用。考察1880—1936年间标题中含有“商务”和“商业”的文章总数量变动趋势,和各类文章数量变动趋势(见表2),可以发现在1880—1896年、1897—1911年、1912—1936年三个时期里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点。

表2 1880—1936年间各类文章数量变动趋势

		1880—1896	1897—1911	1912—1913	1914—1915	1916—1918	1919—1922	1923—1926	1927—1936
商务 和商业 ¹	合计	数量较少	明显增加, 波动较大	波动中增加					
	商务	数量较少	数量多 ² , 波动大	缓慢增加					
	商业	1896年首次出现总体呈 增加趋势		波动中明显增加 ³					
国外 问题 ⁴	合计	数量少	数量较多, 波动大	数量较少			数量较多,波动大		
	“商务” 中该项	数量少	呈减少趋势		缓慢增加				
	“商业” 中该项	1896年首次出现总体呈增加趋势							
经济 概情 与调 查统 计 ⁵	合计	数量很少	波动中减少	总体呈增加趋势					
	“商务” 中该项	数量很少	数量多 ⁶ , 波动大	数量较少					
	“商业” 中该项	1897年首次出现数量不多						明显增加	
教育 和常 识普 及	合计	波动中呈增加趋势		波动中呈增加趋势					
	“商务” 中该项	1894年首次出现 1894— 1905年间波动中呈增加 趋势; 1906—1911递减, 数量不多		数量很少					
	“商业” 中该项	1897年首次出现波动较大							

续表 2

		1880—1896	1897—1911	1912—1913	1914—1915	1916—1918	1919—1922	1923—1926	1927—1936
条约、 经济 法规和 政策	合计	数量多,波动较大		数量少					数量多
	“商务” 中该项	1897年首次出现数量多,波动大		数量少					
	“商业” 中该项	1902年首次出现数量少							数量多 ⁷
经济 问题 探讨	合计	数量少	有所增加, 波动较大	波动中呈增加趋势					
	“商务” 中该项	1882年首次 出现数量少	集中在这一 时期呈减少 趋势	数量较少					
	“商业” 中该项	1897年首次出现数量不多		数量多波动中呈增加趋势					
经济 机构 和组织 事务	合计	数量多			数量少			数量不多	
	“商务” 中该项	1902年首次出现数量多			数量少				
	“商业” 中该项	1898年首次出现数量不多,波动大			数量少			数量较 多	

注:1. 至1911年,历年“商务”出现次数基本多于“商业”出现次数,自1912年起前者少于后者。

2. 1880—1936年间标题中含有“商务”文章总数的78%集中在这一时期。1897年最多,达460篇。

3. 1931年最多,达1318篇,主要是来自1931年《国际贸易导报》,发布了大量(多达1020篇)有关国内丝业、航运、金融、水产品等市场状况,国内埠间贸易和对外贸易,世界各国贸易和主要商品市场状况的信息。

4. 至1913年,历年“商务”中有关国外经济问题的文章数量基本多于“商业”中有关文章数量,自1914年起前者基本少于后者。

5. 至1916年,历年“商务”中关于经济概情和调查统计的文章数量基本多于“商业”中有关文章数量,自1917年期,前者显著少于后者。

6. “商务”中有关国外经济问题的文章总数的73%集中在这一时期。1897年最多,达215篇。

7. 1935年和1936年尤其多,占条约、经济法规和政策类文章总数的45%,其中大部分来自《商业月报》所刊登的工商业法令解释。

1897年之前,标题中含有“商务”和“商业”的文章数量较少,1897—1911年间数量明显增加波动较大,1912—1936年间总体呈增加趋势(见图1)。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使中国市场被迫进一步开放,通商口岸大量增设。^①《马关条约》正式确定外国在华取得口岸设厂权,并使其在华制造商品享有与进口洋货一样的低税待遇。1895年以后外国资本获得在中国内地的开矿权和铁路建筑权等。外国资本获得铁路修权之后开始大规模修建铁路,1895—1913年间华北建成数千公里铁路支线,从天津、青岛等沿海口岸通往内陆的铁路网骨架基本形成。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随后有更多华资银行成立。1905年后中国新设厂矿企业规模和资本有明显扩大和增长,新设企业也从沿海、沿江口岸向腹地城市延伸。这些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粗线条勾勒,与社会对“商务”和“商业”的关注趋势基本相符。

国外经济类文章数量所占比重在1911年前后分别经历一个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1900年之前该类文章数量所占比重较高(高于28.3%),1901—1936年间除个别年份外,其他年份比重均低于1900年之前(见图2),也就是说,社会对国内经济问题的关注程度相对在提高。

经济概情与调查统计类文章数量在国内相关问题中所占比重为57%。该类文章数量自1912年

^① 1896—1914年间新设通商口岸54处,是甲午战争前54年所开口岸数目的1.5倍以上,1915—1925年间中国又开放16处口岸。1895—1927年间中国新增口岸中有77%是在内地,促进农产品输出量不断扩大。见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8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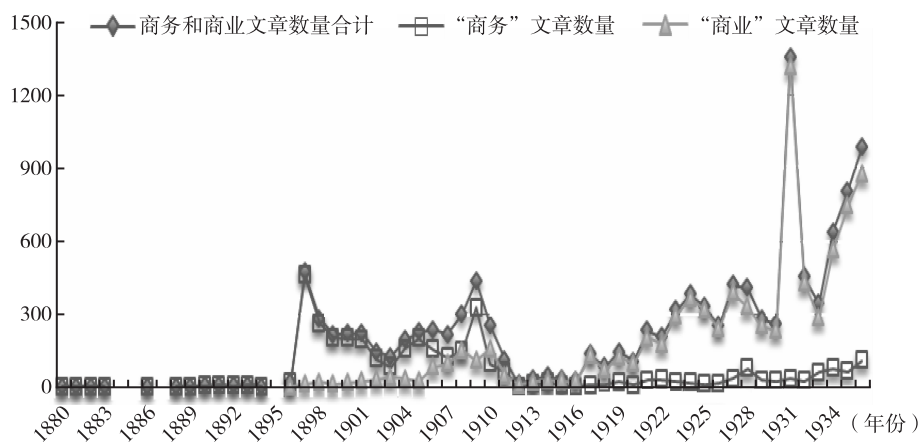


图1 标题中含有“商务”和“商业”的文章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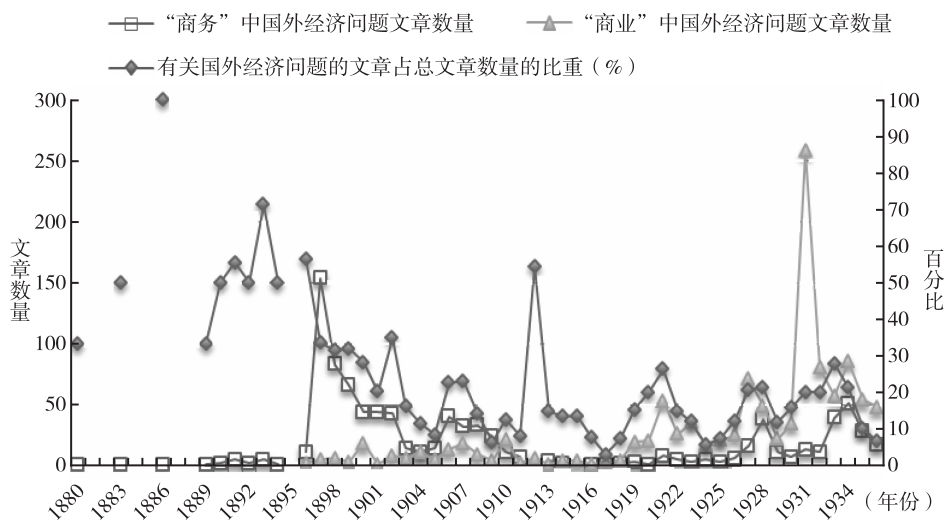


图2 有关国外经济问题的文章数量及比重

起呈增加趋势,所占比重也自1912年起相对稳定,除少数年份之外,历年占比多在52%以上(见图3),即标题中含有“商务”和“商业”的文章在涉及国内问题时,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对经济状况的描述或统计。条约、经济法规和政策类文章在1911年之前数量较多,所占比重较高,在1911年之后除个别年份外均较少(见图4)。甲午战争爆发后,商人、实业家和思想家更强烈地要求放开商办,设厂救国,以商为战,一些官员纷纷提出谋求富强的方案,清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① 1901—1911年间清政府颁布一系列经济法规,包括综合性法规(6项)、行业管理法规(41项)、奖励章程和实业教育章程(14项)三大类。^② 1911年武昌起义时期,革命军发布公告保护商业和商人,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并部分实施一批振兴经济的政策措施。据初步统计,北洋政府在1912—1923年间颁布经济法规共计76项,涵盖工商矿业、农林牧渔、经济社团、税则、银行金融、交通运输等领域。^③ 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1927—1937年间先后颁布中央或全国性重要经济法

①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2页。

②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第1522—1525页。

③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第1571—1575页。

规 200 余项,有关经济的重要决议案 40 余项。^①与此同时,1927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多处根据地,整顿金融制度,制订商业政策以恢复和发展集市贸易,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颁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等根本性法令。不同时期不同政府均颁布经济法规并实施一系列经济政策,清政府时期社会对经济法规和政策关注程度较高,而其他时期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并未在社会对此的关注中得以显著体现,这可能是因为公众逐渐在适应和运用经济法规和政策,而不是去讨论,也可能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概情描述和调查统计等实际资讯是公众更为关心的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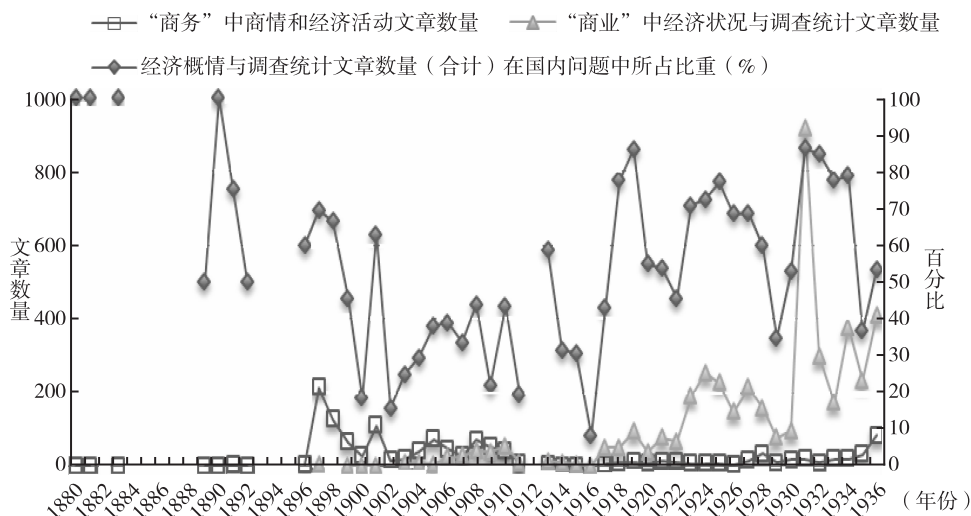


图 3 经济概情与调查统计类文章数量及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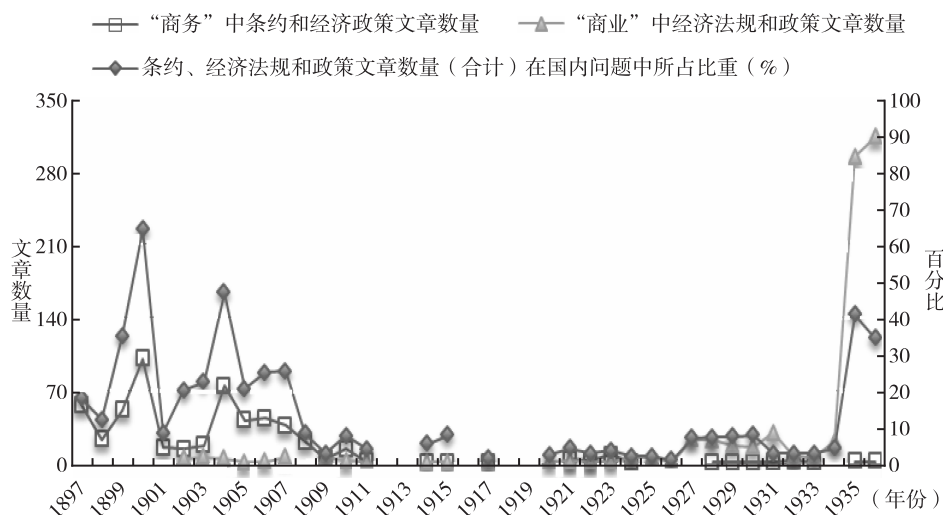


图 4 条约、经济法规和政策类文章数量及比重

教育和常识普及类文章数量在 1894—1911 和 1912—1936 两个阶段分别在波动中呈增加趋势,前一阶段增加幅度大于后一阶段(见图 5)。1901 年刘坤一、张之洞提出在各省设农、工、商、矿等专门学校,培养人才。张百熙在《学务纲要》中规定通商繁盛之区设商业学堂,富于出产之区设工学堂。

^①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一),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9—60 页。

据统计,1909年全国各级各类实业学堂有254所,学生16649人,1912年增加到455所,学生36615人。^① 社会对商务和商业教育、相关知识的关注前期集中在外国教育制度和学堂开办上,后期多涉及商业读物、经商手段等应用性常识,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但关注度不减,从该类文章数量增加幅度和所占比重来看,与商有关的教育和常识普及问题在前一阶段比后一阶段更为紧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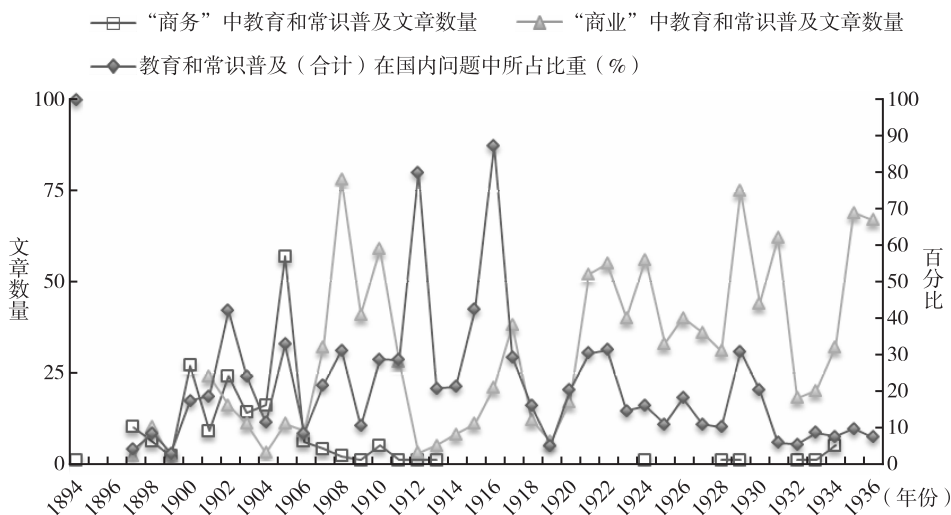


图5 教育和常识普及类文章数量及比重

经济探讨类文章数量在1911年之前波动大,1911年之后大体呈增加趋势,“商务”和“商业”下此类文章数量分别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见图6)。1882—1936年间在46个年份中有涉及经济探讨的文章,共934篇,其中76%分布在27个年份中,在这27个年份中每年文章数量在[15,40]区间内(见图8),即在多数年份中每年文章数量在15篇—40篇之间波动,1897年之前该类文章所占比重较高,1897—1936年间大多在10%上下波动(见图7),可见社会公众对该问题具有持续和相对稳定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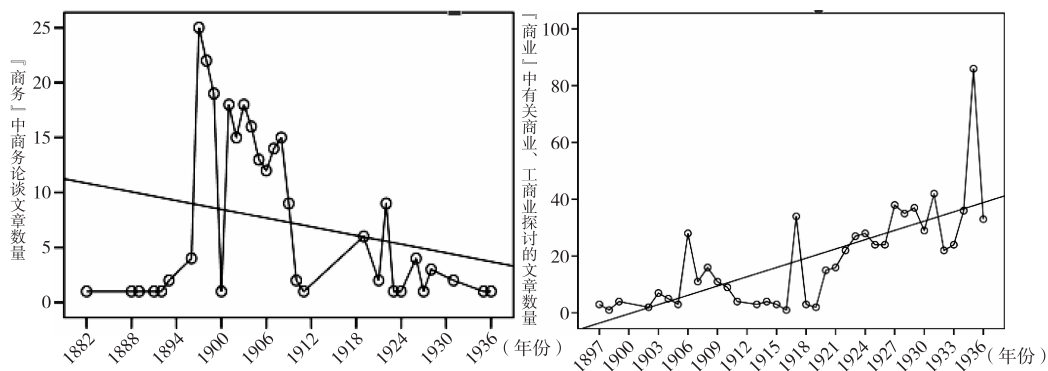


图6 经济问题探讨类文章数量

自1898年起开始出现有关经济机构和组织事务的文章,仅在5个年份中每年文章数量不少于30篇,其他年份每年数量均不超过15篇(见图9),波动不大。八国联军侵华促使清政府于1901年下变法诏,袁世凯主张“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提倡“官商一体”,提出设立商会。^② 1904年

^①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开明书店1934年发行,第145页。转引自王笛《晚清重商主义与经济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4期。

^②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第15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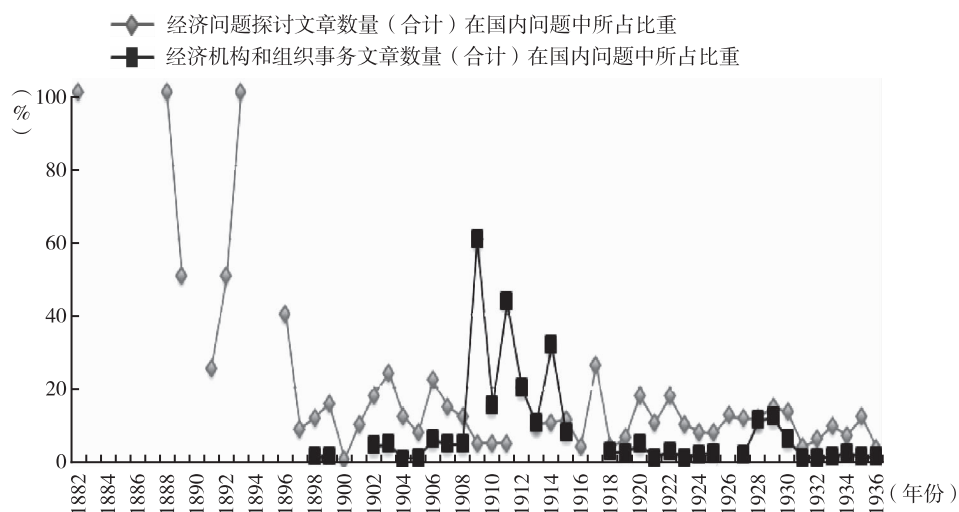


图7 经济问题探讨类文章、经济机构和组织事务类文章数量所占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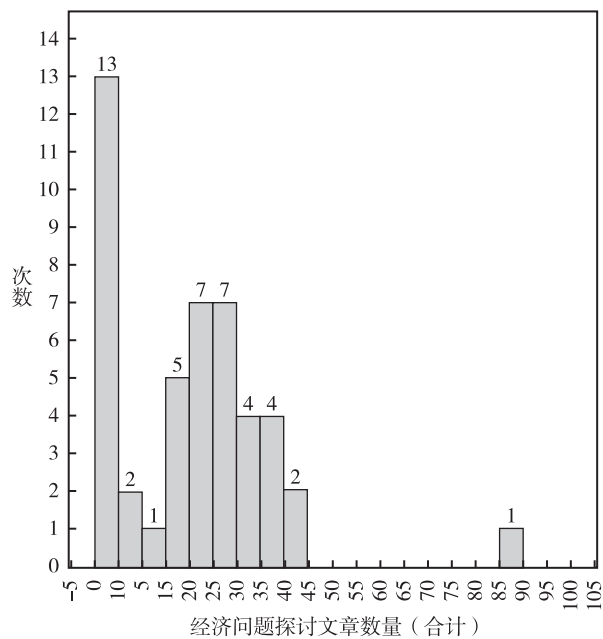


图8 经济问题探讨类文章数量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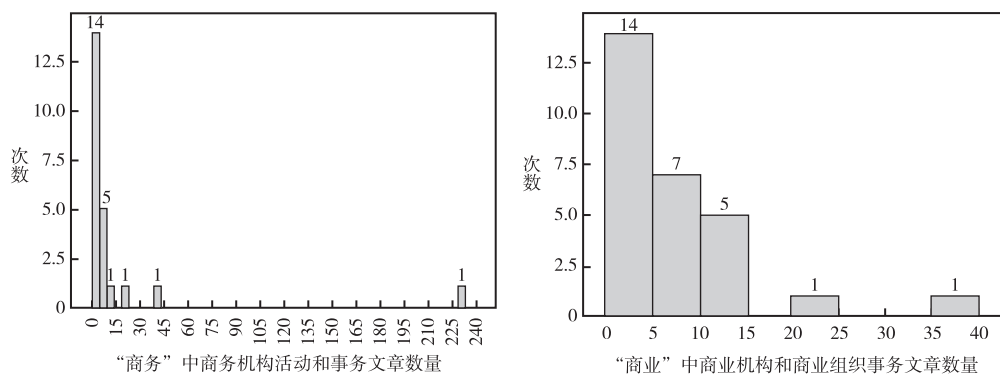


图9 经济机构和组织事务类文章数量分布

清政府核准颁行《商会简明章程》，全国各地成立商会和分会 29 家，1906 年超过 100 家，1912 年全国商会达 794 家。^① 经济机构和组织事务文章所占比重在 1911 前后数年较大，1909 年高达 60%（244 篇，主要来自《华商联合报》所刊登的各商务总会及商务分会的文函和事务。），1911 年为 43%，多数年份不超过 6%（见图 7），社会对该问题的关注具有阶段性。

四、小结

在所考察的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商务”早于“商业”在文章标题中出现，但随着时间推进，“商业”比“商务”得以更普遍的使用。近代有关“商”的观念与古代有关“商”的经济思想相比较，不同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基本没有出现重农抑商、崇本退末这样的主张，二是“商”的涵盖领域更广，而不仅是通有无方面，三是重视商务、商业教育，经商也需“人才”，提倡相关人才培养，相似之处在于经商既是治家求富的一种手段，也是富国、强国的一种途径。与近代大多数以实现国家富强的重商思想不同，在近代有关“商”的观念中关注较多的是商情资讯和调查统计，追求国家富强的目标在相关商业教育、经济法规和经济政策类文章中有所体现，而专门论述和强调该问题的文章并不多。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社会公众对商务和商业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关注内容广泛，“商”并不局限于流通领域，而是涵盖农业、工业、交通运输、金融等产业及不同行业间的联系，不仅包括国内外经济形势、贸易往来、货币金融和财税状况，而且包括经济法规、商务制度、经济政策、商业教育等多个方面。近代对“商务”和“商业”的使用中，以与“商”有关的经济活动资讯为最多，从数量来看，此项内容不断增加，从比重来看，此项内容在社会关注中逐渐占据稳定地位。商业教育受重视程度始终不减，有所变化的是，其重点从介绍教育制度转向传播商业知识。在有关商务和商业的探讨中，对“商”本身性质的论述较少，更多是分析商务形势、影响因素、重要行业状况和提出发展建议。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商”有关的社会观念逐渐更加具有务实的特点，人们关注能为其所用的信息和与其利益相关的经济形势。政府经济政策、经济法规和制度及经济机构活动曾阶段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总体看来缺乏持续性，可能是社会公众当时对此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也可能是受到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结合史料分析，1895 年中国被迫增设通商口岸，中国市场不得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进一步冲击做出反应，工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在内外压力下有所发展，自 1897 年之后社会公众对商务和商业的关注逐渐增加的变动趋势或许与此有关。近代中国历经晚清政府时期、中国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不同时期的政府纷纷介入经济，颁布经济法规，实施一系列经济政策，采取一些发展工商业的举措，除了晚清时期，其他大多并未在社会公众对商务和商业的关注趋势中有相对应的显著体现，其中是否有原因或可能的原因有待另行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王小嘉）

^①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第 1640 页；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四），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16 页。